

A Change in the Later Qing Dynasty: Mass Media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Construction Path of Chinese Modern Cultural Leadership

Yang Haihong

Abstract: The Opium War led to the change in the Later Qing Dynasty, which had made a huge impact on the social order of integrated communication in ancient China, and reconstructed the construction path of Chinese cultural leadership: (1) Discourse subject: intellectuals; (2) Discourse channel: modern newspapers and periodicals; (3) Discourse content: news plus speech; (4) Discourse object: the general public. The change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was not only a change in the media pattern from the “classical center (literati)” to the “newspaper center (reporter)”, but also from the integrated order of “governing religion” to a culture of “divide between politics and religion”. This change in the power order had also shaped a new media landscape.

Key words: A change in the Later Qing Dynasty; Mass media; Cultural leadership

晚清之变：大众传媒与中国近代文化领导权的建设路径转型

阳海洪

摘要：由鸦片战争肇端的“晚清之变”，对中国古代社会一体化传播秩序形成了巨大冲击，重构了中国文化领导权的建设路径：（1）话语主体：知识分子；（2）话语渠道：近代报刊；

作者简介：阳海洪，湖南工业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湖南省文化创意产业研究中心湖南工业大学基地研究员。

课题项目：湖南省社科基金重点课题“晚清湖南报刊史及其史料整理研究（1897—1911）（20ZDB011）”。

文章引用：阳海洪. 晚清之变：大众传媒与中国近代文化领导权的建设路径转型 [J]. 中国新闻评论, 2022, 3(3): 83-93.

<https://doi.org/10.35534/cnr.0303009>

(3) 话语内容：新闻+言论；(4) 话语对象：普通大众。晚清之变既是从“典籍中心（士人）”向“报刊中心（报人）”的传媒格局之变，更是从“治教一系”的一体化秩序向“政教两分”的文化权力秩序之变，塑造了全新的媒介景观。

关键词：晚清之变；大众传媒；文化领导权

Copyright © 2022 by author (s) and SciScan Publishing Limited

This article is licensed under a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Non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nc/4.0/).

<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nc/4.0/>



“文化领导权”（Hegemony）是意大利共产党领袖葛兰西首创的概念。在他看来，作为一种国家治理和社会控制方式，“文化领导权”意指经过说服之后，所获得的一种民众“心甘情愿”服从统治的权力。葛兰西将上层建筑分为“政治社会”和“市民社会”两个部分，并由此阐述文化领导权的实现方式。“政治社会对市民社会的意识形态上的统治，是在市民社会同意的基础上，国家政权机关共同制订与传播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从而对市民社会进行‘精神和道德的领导’，构筑起统治阶级对从属阶级的领导权。”^①作为传统中国意识形态，儒家倡导“礼治”，主张“为政以德”，“怀柔远人”，崇尚文化和道德的力量。汉武帝采纳董仲舒建议，形成了将儒家意识形态的组织能力和中央集权组织能力耦合起来的“一体化”结构，^②维持了中国古代社会的超稳定状态和大一统局面。“一体化”结构以科举机制为枢纽，以儒家典籍为中心，以士大夫为实施主体，推动儒家文化向底层渗透，形成了“书”为主、“报”为辅的文化权力秩序。“故‘官报’从政治上言之，固可收行政统一之效，但从文化上言之，可谓毫无影响。”^③

肇端于鸦片战争的“晚清之变”，使西方文明凭借其坚船利炮，撞开了中国大门，将中国纳入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之中。一方面，作为西方殖民侵略政策的产物，在华外报服务于西方殖民利益，是西方列强撬开中国大门进而入侵中国的“文器”。但另一方面，在华外报客观上充当了传播西方文明的桥梁。与中国古代社会君民以“礼制”为中轴展开互动的王朝国家不同，

①孙晶. 文化霸权理论研究[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4: 21.

②金观涛, 刘青峰. 兴盛与危机[M]. 长沙: 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4: 27.

③戈公振. 中国报学史[M]. 北京: 中国新闻出版社, 1985: 53.

近代民族国家是以“权利”为中轴展开互动的，人民同意才是政府的合法性基础，暴力和征服不是政府的起源，赋予了人民参加意识形态建设的话语资格和话语动力，对国家权力的属性及其来源进行了全新阐释。“人民主权”作为现代国家的组织原则，“创制出新的机制来获取人口对政治共同体的效忠和认同，这就是以自由、人权、法治为内核的公民文化及其社会化的机构和制度，它们成为打破旧的地域共同体、建构新的政治身份和形成集体归属感的国家意识形态。”^①传媒作为民族国家的有机构件，显示出迥异于封建报刊的报业品格，为“一体化”传播秩序提供了新的思想资源和撬动力量。

一、晚清之变与作为新型话语主体的“知识分子”

（一）“国家”与“社会”：中国近代民族国家建构路径的历史困境

近代以来，源于西方的民族主义向全球扩散，掀起了世界民族解放运动高潮，大致形成了英美的资产阶级主导的“社会中心”和德日的官僚体系主导的“国家中心”两种国家转型模式，^②但这两种模式都在中国面临困境，难以转化为可行的建国方案。

1. “社会中心”模式的中国困境

民族国家在英国率先形成，在于1600年前后出现的一系列机缘中^③，新贵族和中产阶级日益接受了人民主权原则，并逐渐发展出现代政治代议制度，形成了以个体权利为价值根基的民族国家形态。随市场经济关系发展与阶级分化而来的资产阶级，成为现代国家建设和传媒发展的领导力量，自下而上地以“社会中心”方式，率先在西欧建成了以保护私有产权为核心的法律制度、分权制衡的民主政治制度为基础的民族国家，市场经济——市民社会——民族国家，构成了自洽的建国路径。“现代民主是西方文明的产物，它扎根于社会多元主义、阶级制度、市民社会、对法治的信念、亲历代议制度的经验、精神权威与世俗权威的分离，以及对个人主义的坚持，所有这些都是在一千多年以前的西欧开始出现的。”^④

在定居型农耕文明中，统治阶级对独立于政权之外的资本力量保持高度警惕。“往者，豪

①陈明明. 作为一种政治形态的政党—国家及其对中国国家建设的意义[J]. 江苏社会科学, 2015(2): 106.

②杨光斌. 制度变迁中的政党中心主义[J]. 西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0(2): 5.

③这些机缘具体包括：玫瑰战争之后，都铎王朝君临英格兰，扶持工商型的新贵族，促成了英格兰封建等级制度的土崩瓦解；封建的土地关系日益让位于市场安排和市场关系，传统农村社会解体和农业重组过程中的优胜者充实了乡绅阶层，圈地运动造成了新的富裕阶层和中产阶级；教育的普及导致了对社会等级体系的重新界定，职业分化为人们的社会流动提供了更多可能性；宗教改革使得与罗马教廷的决裂意义深远，并日益发展出对独立和自豪发展的认可，新教伦理巩固了英格兰民族主义的价值根基——理性主义的个体主义。（[美]里亚·格林菲尔德. 民族主义：走向现代的五条道路[M]. 王春华等，译.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0：23-35）

④[美]塞缪尔·亨廷顿. 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M]. 刘军宁，译.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8：3.

强大家，得管山海之利，采铁石鼓铸、煮海为盐，一家聚众，或至千余人，大抵尽收放流人民也。远去乡里，弃坟墓，倚倚大家，聚深山穷泽之中，成奸伪之业，遂朋党之权，其轻为非亦大矣！”^①所有资源“人君统而守之则强，不禁则亡”。^②因此，中国古代政府不可能是一个西方式的“守夜人”政府，而只能是以道自任的士大夫们组成的事业联合体。士大夫通过对皇权的“分有”，垄断知识体系和官僚政治，与皇权共同压制土地贵族、资本豪强和军人阶层膨胀，避免资本权力化和权力资本化所造成的儒家文化领导权塌陷，这构成科举制后中国历史的基本特征，这导致中国社会难以培育成熟的市民社会及其领导力量——资产阶级，以主导现代国家建构进程。

2. “国家中心”模式的中国困境

“国家中心”模式，即在现代化启动时，由一个具有现代型导向的王权和中央政府来主导国家现代化进程，从而有力促进了统一市场的形成和民族国家的新生。^③这种模式以德国和日本为代表。在德日现代国家转型进程中，王权都扮演了积极角色。但在近代民族主义运动中，满清政府是一个“皇权”加“异族”的、具有双重非法性的政府：从皇权层面看，民主主义对其封建专制构成威胁；从异族层面看，在“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华夷之辨传统中，清政府是异族政权和征服王朝。“族天下”为清王朝提供了一个可以信赖的统治阶层，维护清朝权贵的政治权势始终是它决策的中心。因此，晚清中国与德国和日本不同：作为大一统王朝国家，满清政府既不具备德国、日本那样要扫清封建割据力量，强化中央集权的动力，又不具备德国、日本单一的民族国家属性。“专制”和“异族”的双重非法性使满族统治者感到效法西方的政治变革，将会危及封建王朝的专制统治和本民族的利益，满清政府成为现代国家转型的最大障碍。^④

（二）中国现代文化领导权建设的领导力量：知识分子

“一体化”秩序所形成的超稳定结构，使中国在“国家”与“社会”层面都缺乏近代转型的内在动力。士大夫阶层是古代中国意识形态“操盘手”。作为后发国家，中国现代文化转型

① 桑弘羊著，王利器校注。盐铁论校注：定本[M]。北京：中华书局，1992：78-79。

② 桑弘羊著，王利器校注。盐铁论校注：定本[M]。北京：中华书局，1992：120。

③ 许纪霖。中国现代化史：第1卷[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5：8。

④ 朱维铮如此论述满清政府“族天下”的复杂性：（1）清帝国是一个少数民族压迫多数民族为表征的。（2）与中国历史上其他少数民族建立的帝国不同，这个帝国始终实行旨在守护统治民族特权的反同化政策。（3）随着统治民族的寄生化，这个帝国不得不在严分满汉的同时，又实行满汉共治，并被迫把共治权从文官制度逐步扩大到军事组织。（4）出于被同化的恐惧，这个帝国的君主贵族，在意识形态上始终坚持双重准则，一方面“以汉制汉”，一再由皇帝出面对朱熹学说重作解释，当成汉族上层爬进各级政府的首要条件；一方面固守本民族的萨满信仰，并抬举在边疆少数民族中流行的喇嘛教，以扩大与汉文化对抗的基础。（5）于是在这个帝国整个存在时期的民族关系上，便出现种种矛盾的现象，在上的满洲君主独裁与在下的汉族文官横向并存，在内地的旗人形成被汉人割裂的各个据点与在边疆的少数民族保持与汉族文化差距相映，在中央政府继续严分满汉的权力结构与各级地方政府愈来愈受汉族官吏控制的奇特反差。（朱维铮。音调未定的传统：增订本[M]。北京：中信出版社，2018：122。）

的领导力量是由传统士大夫阶层分化而来的。殖民入侵在催生买办制度和官僚资本的同时，也产生了抵抗帝国主义的经济和政治力量。“为了侵略的必要，帝国主义给中国造成了数百万区别于旧式文人或士大夫的新式的大小知识分子。”^①19世纪70年代，在曾国藩、李鸿章主导的洋务运动中，形成了一个由传统士大夫阶层转化而来的由幕僚、商人买办和知识分子群体。得益于中西交通的时代，他们有着比同时代人相对丰富的海外经历，从而以自己的深度体验感知到了中国正逐渐融入国际秩序的趋势，切身感受到了西方文明的先进性与优越性，认识到必须学习西方文明，并将之转化为中国进行现代化改革的动力，才能实现民族救亡目标。而这些具有现代导向的知识分子，作为“社会”（资产阶级）与“国家”（王权力量）之外的替代性力量，引领时代风气，成为广泛改革铺平道路的关键“少数”和现代文化领导权建设的话语主体。

1. “城市空间”与中国近代知识分子的形成

鸦片战争在揭开中国历史“屈辱性”记忆的同时，也给中国带来了因不平等条约而开放的通商口岸城市。依托香港、广州和上海等城市空间，形成了具有近代意识的知识分子群体。以社会分工为基础的现代教育也改变了为帝国培养官员的科举体制。1905年的废科举改革，截断了古典士大夫阶层的形成途径，一个广泛的知识分子阶层在中国日益形成。同时，近代工业文明实现了人类历史上的动力革命，“作为现代工业革命成果的机器复制第一次使文化经济拥有了现代产业形态，使文化产品的规模生产和大批量的复制由可能变为现实”^②。大规模复制技术及由此而来的新闻商品化生产通道，使近代报刊得以从政治威权结构中解放出来，为知识分子疏离皇权，获得人格独立提供了可能性。近代城市为报业提供了新闻来源、交通网络、消费群体和广告收入，依托新闻出版业和教育机构，知识分子在中国迅速形成，职业报人逐渐进入了近代知识分子的视野。

2. “媒介空间”与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形成

近代报刊作为印刷资本主义的产物，不但意味着传播内容变化，也意味着传播关系再造。信息生产的商品化和产业化，解构了官报时代以君权为中心的纵向传播体制，构建了一个以报人和受众为中心的横向传播模式，并借助大众读者群，形成强大的舆论力量，报人由传统社会的“清议者”向报刊时代的“政论家”转型。民族救亡与广办报刊之间的关联，使报人在获得体制外办报正当性的同时，也意识到现代报刊凭借所载内容的广泛性和读者群体的大众化，获得传统政治体系之外的舆论力量，成为与传统科举不同的新型精英和意见领袖，从而以战斗姿态、深度介入国内外政务大事之中，获得了极大的文化传播能量，报刊也成为晚清知识分子聚集的重要场所。简言之，作为新型权力的媒介权力，在于这些走出书斋的媒介精英，是能够整合大批个人意志的、依靠人民的意见领袖。王韬等由传统儒家士大夫阶层分化而来的知识分子，

①毛泽东. 毛泽东选集：第4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487.

②胡惠林. 文化产业学[M].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30.

麇集于香港、上海等口岸城市，在华外报的办报实践及其对西方文明的介绍，使他们意识到，作为印刷资本主义的产物，报刊具有介入社会生活的赋权能力，对中国报刊由旧入新的功能、角色再造产生了重要影响。

二、晚清之变与作为新型话语渠道的“近代报刊”

在华外报通过媒介技术和报刊理念的传播与实践，向国人展示了近代报刊是迥异于中国“邸报”的新式传媒，它所具有的优越性，使其在国家建构中扮演着重要作用。中国要吸纳西方文明的优秀成果，推动话语建构渠道从“典籍”向“报刊”转型。

（一）“机械印刷”：报刊作为新型话语渠道的“同时性”

“传播的基本含义是一个信息得以在空间传递和发布的过程，以达到对距离和人的控制。”^①传者凭借大众媒介，通过在广阔区域内传播信息，以劝服受众，引起受众态度改变和行为变化，以达到权力统治格局的形成。作为印刷资本主义产物的报刊，在为人们理解世界提供了新的传播渠道的同时，其标准化、同时性的文化生产方式，能够在全国形成一致的思想行为模式，深刻影响人们的思想和行为方式。借助报刊所形成的这种“同时性”，使辽阔地域的人们开启对彼此关系的相近性想象，并建立起命运关联的情感联系和文化记忆，将分散的、地域性的个体联结成为统一的、彼此依赖的民族共同体。

中国古代手工作坊式的新闻生产，因无法大规模复制，也就难以在广覆盖性基础上形成共同的国家认同和民族精神。中国报业的技术转型是由传教士来完成的。1853年，英华书院和马礼逊教育会在香港共同创办了《遐迩贯珍》月刊，利用英华书院的中英文印刷设备，成为第一家用铅活字印刷的中文报刊，基本结束了中文近代报刊雕版印刷的历史，实现了报刊印刷技术革命，大大提升了信息和知识生产能力。

自报馆兴，凡电线可通之处，即此一日中，各国新闻未有不尽知者矣，此报馆所以与电线相辅而行也。且不独众人之事由此而知，即各国兴衰之机，尚在隐微未露，一经报馆将其军政国事揭而论之，则人心之从违即可由此而定。近代新学日出，军械轮船均随时花样翻新，各国购办半皆由报章而增见识。此外各国之商货价值起落，虽数万里外，亦可于一日之内坐而致之。是以泰西人士足迹不出户庭，而天下利弊损益皆可自操其权也。^②

以机械复制为技术基础的报刊，使知识与信息成为具有易得性的产品，迅速改变了中国古代社会思想观念的“内卷化”局面，大大加快了近代中国知识生产与传播的速度与频率。

^①徐燕斌. 中国古代的政治传播与社会控制述略：基于媒介史的视角[J]. 现代传播, 2017(10): 51.

^②胡太春. 中国近代新闻思想史：上卷[M]. 上海：东方出版社, 2015: 214.

（二）“报异于书”：报刊作为新型话语渠道的“可接受性”

传教士在向国人介绍报刊这个“新媒体”时，为降低跨传播中的“文化折扣”，提升传播效果，他们从“报附于书”和“报异于书”两个方面论证报刊在中国的“可接受性”：一方面，在华外报延续“典籍中心”传统，强调“新报”与“书籍”一样，都是知识载体。简言之，“广闻博览”是读书人“格物致知”的重要前提。作为近代中国第一份中文刊物，马礼逊将其命名为《察世俗每月统记传》，以寓“察世观俗，增长见闻”之意。因此，“察世俗书”既登载“神理”“人道”“国俗”“天文”“地理”等各种知识，且“人若是读了后，可以将每篇存留在家里，而俟一年尽了之日，把所传的凑成一卷，不致失书的道理，方可流传下以益后人也。”^①《六合丛谈》也强调“书”“报”相通。“今予著《六合丛谈》一书，亦欲通中外之情，载远近之事，尽古今之变，见闻所逮，命笔志之，月各一编，罔拘成例，务使穹苍之大，若在指掌，瀛海之遥，如同广衽席。……是书中所言天算舆图及民间事实，纤悉备载。粤稽中国载籍极博，而所纪皆陈迹也。”^②另一方面，在华外报强调“报刊”与中国古代的“书籍”“邸报”相异，为中国所无，乃西方文明的“长技”。1854年在宁波创刊的《中外新报》索性以“新报”命名，以示与“邸报”“京报”的区别。

1. 连续出版

《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在《新闻纸略论》中，对西方报刊做了简单介绍，其中就论及其刊期固定、连续出版的特征。“其新闻纸有每日出一次的，有二日出一次的，有七日出二次的，亦有七日或半月或一月出一次不等的，最多者乃每日出一次的，其次则每七日出一次的也。”^③《申报》更直截了当地说：“新报之事，今日之事也。今日之事何便乎？盖古书仅集前人之意以为今日之鉴；新闻则书今日之事，以见今人之才。”^④报刊连续出版，关注新鲜事件，划清了与“书籍”的界限。

2. 内容丰富

“邸报”指刊载谕旨、奏章等官文书，而“新报”则“凡国家之政治，风俗之变迁，中外交涉之要务，商贾贸易之利弊，与夫一切可惊可愕可喜之事，足以新人听闻者，靡不毕载。”^⑤“新报”内容覆盖广泛，是社会的“百科全书”。

3. 信息真实

《遐迩贯珍》认为，“邸报”所载信息“颇难早得确耗”，这是朝廷在处理太平军事件中“方枘圆凿”，难以取胜的重要原因：中国“平时透达信息，多由耳食传闻，或由书筒寄递，

①张之华. 中国新闻事业史文选（公元724年—1995年）[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77.

②张之华. 中国新闻事业史文选（公元724年—1995年）[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82.

③转引自黄旦. 媒介就是知识：中国现代报刊思想的源起[J]. 学术月刊，2011（12）：141-142.

④转引自邵志择. 近代中国报刊思想的起源与转折[M]. 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1：69.

⑤《申报》馆. 本馆告白[N]. 申报，1872-04-30（1）.

素有携带书函以资营生，其日行至速，亦逾一百二十里。故此土相距辽远之事，颇难早得确耗。除系要事，关系官宪，应奏朝廷者。毕竟入于京抄，众目共睹，列后所叙各情，间亦得于此。但所叙仅撮其时日。及地方，因其铺张各说，原难凭信，且其所载专指军兴之事，亦未精详，尤属迂阔。故除时地之外，足征不讹者无几。”^①

4. 传播迅速

“新报”借助现代邮政交通事业，“顷刻而四方皆悉其详”。“中国除邸报抄载上谕奏折，仅得朝廷大略外，向无日报之类。惟泰西各国，如此帙者，恒为叠见，……其内备载各种信息，商船之出入，要人之往来，并各项著作篇章，设如此方，遇有要务所关，或奇信始现，顷刻而四方皆悉其详，前此一二人所仅知者，今乃为众人所属目焉。”^①

5. 沟通上下

在华外报认为“邸报之作成于上，新报之作成于下”。作为国家与社会之间的“两栖组织”，“新报”既载“国家大事”，也具有“民间性”，它面向“农工商贾”，关心“闾里琐屑”的民众生活，足以通达民情，沟通上下。“邸报之制，但传朝廷之政事，不录闾里之琐屑而已，故阅之者学士、大夫居多，而农工商贾不预焉，反不如外国之新报人人喜阅也。”^②

于晚清中国而言，媒介即知识，报刊既可以传播“新知”，“更重要的是它本身就是一种‘新知’，属于东渐的‘西学’”^③。在华外报极力向中国文化靠拢，介绍新闻“知识”，凸显报刊传播优势，论述办报的重要性，并呼吁中国广办“新报”：“欲强国必须富民，欲富民必须变法。中国苟行新政，可以立致富强，而欲使中国官民皆知新政之益，非广行日报不为功，非得通达时务之人主持报事，以开耳目，则行之者一，泥之者百矣。其何以速济？则报馆其首务也。”^④报刊作为国民“养成所”，被置于民族救亡与国家建设的中心地位，成为影响近代中国政治改革、社会变迁与文化更新进程的历史变量，是意识形态建设的前沿阵地和最为重要的文化资源。

三、晚清之变与作为新型话语内容的“新闻”与“言论”

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生产机制，中国古代的实录精神，虽也强调要据“实”而“录”，要求以儒家道统规范对史实的解释，但它依赖“天命”“神迹”的政治神话构建，且以帝王将相等“倜傥非常之人”为叙述对象，在世俗化和日常化的现代社会中，这种建构途径难以获得“自然化”的传播效果和干预现实政治的力量。中国古代的“邸报”“京报”，并无自行采写的新闻与言论，难以成为向社会渗透的文化阵地。作为印刷资本主义产物的报刊，其新闻和言论在实现向社会覆盖和渗透

① [日]松浦章. 遐迹贯珍: 附解题·索引 [M]. 上海: 上海辞书出版社, 2005: 714.

② 《申报》馆. 邸报别于新报论 [N]. 申报, 1872-07-13 (1).

③ 黄旦. 媒介就是知识: 中国现代报刊思想的源起 [J]. 学术月刊, 2011 (12): 139.

④ 赵云泽. 作为政治的传播: 中国新闻传播解释史 [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7: 62.

的同时，其“即时性”也使其成为介入现实的有力武器，因而成为近代国家意识形态建设的有效渠道。

（一）作为“目的选择”的“新闻”

“政治或其他意识形态只有成为无须省思的‘常识’，才真正具有对生活世界的型构力量。新闻报道的‘修辞性’，即是力图将陌生的现实日常化，变成可理解的、具有情感认同功效的话语实践。”^①新闻作为“日常修辞”，它必须面向民众，在微观修辞中获得型构社会的意识形态力量。“新闻宣传之所以能收到比较好的宣传效果，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它用事实说话，而且是用新近发生的事实说话。”^②新闻虽以客观、真实为诉求对象，但真正成型的新闻文本无不是按设定框架进行目的性选择的结果，并通过对现象世界的目的性选择，抹去意识形态对现象世界的“暴力”介入，而以“自然化”方式，将意识形态融入其中。

传教士来华办报，旨在将其作为意识形态桥梁，为殖民侵略政策扫清障碍。“泰西以兵力通商，即以兵力传教。其尊教甚至，其传教甚勇。其始欲以教易人之民，其后以争教取人之国”。^③为证明西方并非“蛮夷之地”，而是政教昌明之邦，也辅以对西方科学技术和政教制度的介绍。在这种学术传教路径下，在华外报将介绍西方文明作为报刊的主要内容，掀起了用科学知识来唤起中国觉醒的办报高潮。以《万国公报》为代表的在华外报，创办“广学会”等传教机构，“学会”与“报刊”互为表里，以大量篇幅报道中外新闻，比较中西之间政治制度的差异，介绍泰西政教文明与文化科技。为扩大社会影响，在华外报强调报刊“贵在信实无欺”，标榜“序事必求实际”，^④为维护新闻真实性及报刊如何在实践中贯彻新闻真实性发挥了积极作用。但从其殖民立场出发，认为“欲吾道之兴先彼教之毁”，并通过“选稿畸形”的新闻报道^⑤，在将资本主义“制度模式”“价值观念”建构为“进步”形象的同时，也将中国建构为——“愚昧野蛮”“封建专制”的东方帝国——的“他者”形象，冀图掌握叙述中国的话语权，从而将其纳入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中来。“其所立论，往往抑中而扬外，甚至黑白混淆，是非倒置，泰西之人只知洋文，信其所言，以为确实，遇有中外交涉事，则有先入言以为之主，而中国自难与之争矣。”^⑥

（二）作为“政治表达”的“言论”

作为“言论自由”的表征，在华外报“理论各事更为随意，于例无禁”。^⑦在华外报在传播西方政教文明的同时，也利用言论自由积极介入中国事务，参与中国话题讨论，为“洋务运

①丁云亮. 媒介化社会国家认同的修辞建构[J]. 学术界, 2018(4): 115.

②《新闻学概论》编写组. 新闻学概论: 第2版[M].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20: 128.

③胡子春. 中国近代新闻思想史·上卷: 增订本[M]. 上海: 东方出版社, 2015: 259.

④方汉奇. 中国新闻事业通史: 第1卷[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6: 420.

⑤胡太春. 中国近代新闻思想史·上卷: 增订本[M]. 上海: 东方出版社, 2015: 111.

⑥王韬. 与方照轩军门书[A]//弢园尺牍. 北京: 中华书局, 1959: 233.

⑦黄旦. 媒介就是知识: 中国现代报刊思想的源起[J]. 学术月刊, 2011(12): 142.

动”“维新变法”等改革运动建言献策、摇旗呐喊，并发表了大量言论。以《万国公报》为例，“1880年至停刊之时的1883年，《万国公报》批评与建议的容量已经上升到全刊的一半左右，其中1880年为48%，1881年为57%，只有1883年为26%。”^①《万国公报》《申报》的言论机制，凭借其“大众化”读者群，掌握了强大的舆论力量，衍生出监督批评政府的社会角色，并对报刊自身势力进行了成功构建，因而拥有了持续而深入地介入国家政治的意识形态和社会动员能力。在华外报以其“言论自由”实践“暗示”中国知识界：包括朝廷决策在内的所有问题，都可借助报刊这种“体制外”的“言路机制”进行公开讨论，报人可以凭借手中之笔拥有超越于政治之上的舆论力量。“防壅塞，通民情”本是中国文人论政传统的核心话题。而在“新报”那里，晚清报人找到了实现儒家理想的更好方式。在华外报创设学会、学校和印刷厂等文化设施，强化舆论引导效果的意识形态策略，都给国人留下鲜明印象和效法空间，其“办报开智”原则，回应了中国遭遇西方之后如何实现现代化的重大主题，对这个“中国问题”的回答，迎合了当时求索救国道路的先进知识分子的兴趣。

四、晚清之变与作为新型话语对象的“普通大众”

尽管从意识形态策略而言，在华外报意识到中国社会是由官绅阶层统治的，要想树立西方文明在中国社会的统摄地位，就必须以官绅阶层为传播对象。“如果我们要影响整个中国，就必须从他们下手；只有我们愈是博得士大夫的尊敬，我们在中国的事业才愈能顺利进行。”^②但在理论上，人民主权原则与新闻商品属性，“普罗大众”作为国家的主体，应该享有媒介接近与消费的权利。

（一）作为国家主体的“大众”

“人民主权”作为近代国家建设的基本原则，其权力获得与解除都以“多数决”的民意为依据。“泰西各国所行诸大端，其中最紧要而为不拔之基者，其治国之权属之于民。”故“治国之法亦当出之于民，非一人所得自主矣。然必分众民之权，汇而集之于一人，以为一国之君。此即公举国王之义所由超也。而辅佐之官亦同此例也。”^③与解释型的“天命论”不同，现代政治属于认同型合法性，它不需要中介阶层向民众进行阐释，而直接依赖于公民的理性能力与自我判断。因此，传媒不再是精英阶层的教化工具，而成为人们信息共享和政治参与的渠道，民众通过自由讨论达成重叠共识和政治认同，并在此基础上，对民意进行“数目字管理”，为公共决策和“主权在民”进行刚性约束。

① 邵志择. 近代中国报刊思想的起源与转折 [M]. 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1: 40.

② 阎小波. 中国早期现代化中的传播媒介 [M]. 上海: 三联书店, 1995: 12.

③ [美] 林乐知. 译民主国与各国章程及公议堂解 [A] // 李天纲编. 万国公报文选. 北京: 三联书店, 1998: 437.

（二）作为消费主体的“大众”

报刊作为工业文明和资本主义的产物，它必须面向普通消费者，实现新闻产业化。“夫新报之开馆卖报也，大抵以行业营生为计。”^①“新报”“价亦甚廉，虽寒素之家，亦可购阅”。^②消费属性在改变精英化读者定位的同时，也要求语言通俗化，以推动意识形态向底层渗透。“务使措词字质而无文，论事宜显而弗晦，俾女流、童稚、贩夫工匠辈，皆得随时循览，以扩知识，而增见闻。”^③“新报”改变了“官营官阅”的新闻消费格局，普通民众得以成为传媒的消费者，造成了大众社会的崛起。

五、结语

西方文明具有强大的宗教背景，形成了精神（“教会”）与世俗（“政治”）二元的政体结构。在近代民族国家建构过程中，政教一体向政教二分转型，神权与政权分离。在教会与世俗政治无涉的同时，国家也不能干涉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这成为一个关于政治社会（“国家”）与市民社会（“公民”）相互分离的基本原则。“作为现代政治的基本表征，现代国家也力求恪守道德、价值或善的中立性，在面对各种善或价值的冲突，也就是所谓的‘诸神之争’时，保持一种超然或客观的姿态，不仅没有直接介入其中，而且甚至避免表现出任何倾向性。”^④个人自由的优先性要求国家在价值领域坚持中立原则，反对预设道德立场。国家将言论推入“自由”的公共空间领域。任何思想和言论必须经由“多数决”原则后才能进入公共决策领域。晚清之变将人民主权、国家中立的民族国家原则引入中国，从价值基础到传播链条都对“一体化”传播秩序构成了强烈冲击，塑造了全新的媒介景观。从秦汉之变到晚清之变，既是从“典籍中心（士人）”向“报刊中心（报人）”的传媒格局之变，更是从“治道合一”的“一体化”秩序向“政教两分”的文化权力秩序之变。中国缺少西方“政教分离”的宗教背景及自治传统的市民社会，中国要在西方殖民侵略背景下，在一盘散沙式的乡土社会中建设现代民族国家。中国近代新闻事业如何在“城市—乡村”二元结构中，利用报刊力量将作为精英话语的国家观念扩展到广袤的乡土社会，将农民组织到国家中来，彻底改造乡土社会的“低组织”状况，成为能否确立意识形态权力、推动国家现代转型的关键。历史总是在“力的平行四边形”中开拓前进的，“传统/中国”与“现代/西方”构成了近代中国传媒转型的规约力量。在近代国家重建的主轴之下，价值体系重建和沟通体系改造构成了两条副线，而副线的伸缩范围和振幅宽窄，取决于国家重建的需要。简言之，“一体化”传播秩序，依然是中国现代新闻传播思想的深层结构，承担着对象切换、场景迁移和议题重置的新任务和新使命。

① 《申报》馆. 论本报馆作报本意 [N]. 申报, 1875-10-11 (1).

② [日] 松浦章. 遐迹贯珍: 附解题·索引 [M]. 上海: 上海辞书出版社, 2005: 714.

③ 《申报》馆. 劝看民报 [N]. 1876-05-19 (4).

④ 吴增定. 利维坦的道德困境: 早期现代政治哲学的问题与脉络 [M]. 北京: 三联书店, 2012: 3-4.